

復旦 改變人生

卿云歌

燕爽
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复旦改变人生

卿云歌

燕 爽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改变人生:卿云歌/燕爽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309-04693-5

I. 复… II. 燕… III. 复旦大学-校友-生平事迹
IV.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151 号

复旦改变人生

近思录·笃志集·卿云歌

燕 爽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邬红伟 陈丽琴 白国信

装帧设计 暄氏文化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74.25 插页 6

字 数 853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309-04693-5/G·606

定 价 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俾使复旦蒙其光荣（代序）

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61年前，在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时刻，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告诫即将毕业的复旦学生：“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终身将留有复旦之符号。诸生与复旦之此种关系，将永继续。诸生一生中如有成就，复旦将蒙其光荣。若有挫折，则亦牵累复旦，同受其害。须知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其学生。”回眸复旦的世纪历程，咀嚼李登辉先生的告诫，我们不难体会：复旦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与学生的成长紧密相连，复旦与校友荣辱与共，始终相依。

为此，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发起了“复旦改变人生”教育活动。超过1 000名学生组建了300个采编小组，采访了近300位校友，联络、访谈和整理工作累积38 000多小时，录音整理稿超过230万字。学生们在访谈结束后，还志愿提交了130余篇近20万字的采访随感。

作为这一活动的主要成果，《复旦改变人生》丛书收录了其中逾160位校友的访谈录。他们当中，既有院士、政府高官、商界巨子这样一些“显要”，也有在各行各业显山露水的“精英”，还有在普通岗位上勤勉奋斗的社会中坚力量。在他们身上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旦精神”，铭刻着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烙印；在他们不同人生的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对祖国的赤诚、对民族的热爱。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民族的坎坷与复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你可以读出一部鲜活的复旦“校史”；你还可以从个人的人生经验中找出“终身留有的复旦符号”。这些校友也纷纷对当下在校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提出看法,在肯定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的同时,希望学弟学妹们踏踏实实读书,保持平民心态,怀揣对知识的敬畏。真是语重心长,备见真淳。

校友是复旦发展的见证人,更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学生的成长也离不开校友的关爱。有一位管理学院的受访校友对联系的同学表示:“我愿意将蕴含着自己20年复旦底蕴的感情投资到学弟学妹身上!”其实,同学们采访校友的过程,也是一个向老校友们学习的过程。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迥异的人生轨迹,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他们健康的道德理想和深沉的人格魅力,对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在校学生来说,无一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教育价值。

我要感谢为本书策划、编撰和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人员。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庆典前夕,《复旦改变人生》得以出版,是大家用行动向复旦历史表达尊重,向百年校园表达热爱,对历年校友表达尊敬和真诚。由于大家的努力,在校友与复旦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又一个沟通的桥梁、又一个精美的纽带。

在文章的最后,我要以学校以及我个人的名义,衷心地祝愿复旦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奉献社会,报效国家,俾使学校更多地“蒙其光荣”;也衷心地希望复旦在第二个百年中不断发展,造就出大量的使学校“蒙其光荣”的学生。学校和校友共同努力,使“复旦之符号”广为流传,复旦之精神发扬光大。这正是我们复旦大学和所有复旦校友的神圣职责。

目
录

Contents

- 1 母校情谊 历久弥新——吴强校友访谈录
- 10 从历史起航,追寻那光——苏德慈校友访谈录
- 16 打好基础 踏实敬业——须一平校友访谈录
- 22 从士兵到学生——吴万兴校友访谈录
- 30 我的人生第一步——方进元校友访谈录
- 39 三进复旦,在实践中求真知——董剑珍校友访谈录
- 46 我把爱因斯坦带到复旦——吴少海校友访谈录
- 50 我灵魂的家园——许德民校友访谈录
- 59 那片自由的沃土——夏小华校友访谈录
- 64 乒乓·日语·电视人——吴四海校友访谈录
- 73 未来难料,只愿守望理想——姜鸣校友访谈录
- 79 无悔的选择——於炯校友访谈录
- 89 青春从这里扬帆——赵海根校友访谈录
- 99 我在复旦烧咖啡——夏旻校友访谈录
- 108 把握自己的命运——陈克伦校友访谈录
- 116 难忘的 8515——杨德红校友访谈录
- 123 从物理学走向商界——唐海松校友访谈录
- 130 让岁月沉淀我的感念——黎瑞刚校友访谈录

- 138 复旦给我生命的底色——胡劲军校友访谈录
- 146 燕曦流年——张晓帆校友访谈录
- 153 回忆我们的创业之路——梁信军校友访谈录
- 161 成才要素经验谈——郑磊校友访谈录
- 168 梦想开始的地方——闫丘露薇校友访谈录
- 176 从海军少校到首席证券分析师——金晓斌校友访谈录
- 184 奋勇于创新 永不言败——沈浦阳校友访谈录
- 190 扎实的复旦外语人——吴佳明校友访谈录
- 197 登山者——陈天桥校友访谈录
- 206 美复旦之美——吴烨宇校友访谈录
- 216 精算人生——薄卫民校友访谈录
- 224 光荣的第一批“人才工程”队员——孙程坤校友访谈录
- 228 淡泊性格造就我——蒋宾校友访谈录
- 233 我是怎样学会积累“人脉”的——陈冰校友访谈录
- 240 质朴的幸福——周知明校友访谈录
- 246 与志同道合者结缘——谈剑校友访谈录
- 252 红色畅想——张琳校友自述
- 261 大学生活,给我最好的馈赠——郭冰娜校友访谈录
- 271 我的青春见证——赵毅校友访谈录
- 281 日精日新——金麒校友访谈录
- 291 成长就像是一枚青橄榄——施琪校友访谈录
- 297 最重要的是对病人负责——郑吉莉同志访谈录
- 304 阳光灿烂的日子——朱力榕校友自述
- 313 沉甸甸的责任感——冯艾同志访谈录
- 326 事业的起点——顾弘校友访谈录
- 331 学业 创业 事业——徐良衡校友访谈录
- 338 人文复旦与 IT 工程师——张峥校友访谈录
- 345 我的蓝白红之梦——王明泰校友访谈录
- 353 复旦把我送上“申博”之旅——张帆校友访谈录
- 360 全球第一,我与复旦共贺——吴晨校友访谈录
- 367 后记

母校情谊 历久弥新

——吴强校友访谈录



吴强在闸北业余大学(现行健职业学院)时的备课照片

吴强,男,1944年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会计系任助教。

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后任中学教师20余年。1979年起从事成人高校教育,邀请复旦校友30余人,率先兴办企业管理及现代会计专业,同时参与发起、筹备复旦上海校友会,任一至四届常务理事,二、三届秘书长。为复旦世界校友联谊会3位筹备人之一,并促成李达三校友为母校捐资兴建大楼。

我今年八十四了,我是1944年从复旦商学院(管理学院前身)会计系毕业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历都非常坎坷,没有多少人是非常平坦的。现在,的确,并不是中国最好的时候,最好的在后面,但是中国始终是在向上。而我们当年处的是什么时代呢?正是国家处于最最危难的时候。我有了记忆后的第一个印象,大概是我六七岁吧,当时我们有个政府官员叫蔡公时,在济南和日本人进行交涉时,被日本人把耳鼻割掉了,历史上叫做“五三惨案”。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碰到这种事。

后来我念初中是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日本人是恨南开的,因为南开的学生爱国。当时我们上午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之间有20分钟的休息,同学们都拥到楼下去看报纸,当天的天津《大公报》已经张贴出来了。看什么呢?看本市新闻头条且总是固定的:“今日海河浮尸×具”!每天如此,今天3具,明天5具,大家都晓得是日本兵营强迫中国民工挖地道,民工累死了,尸体就被丢到海河里,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每天就看这种新闻,怎能不充满着对日本人的仇恨!我的青少年正是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目睹国破家亡的情景,亲历流离失所的苦痛,这些都是今天的学生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长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尽管经历曲折,但无怨无悔,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不受压迫、不被欺凌。那个时候天津有日租界,我平时住在学校里,星期六、星期天回家,因为路远就坐车,车子经过日租界,路过一个日本学校,里面的日本小孩子正在打棒球,他就拿那个棒球扔过来打我。你想,日本那么小的孩子就知道要欺负中国人!我在乡下念高中的时候,看天上日本飞机来了,他们看到下面有学生就在上面转,我们就怕他扫射。

我们那时候不懂,看是日本飞机,就怕它扫射,其实根本没有枪,只是侦察机。那种国破家亡的境况是现在的学生想象不到的!

后来我是在上海读的大学,我原先不是在复旦读,先读的是上海商学院。1940年我读大一,但只读了一年半,“珍珠港事变”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因为我太恨日本人了,所以我无论如何要离开上海到内地去。我辗转千里来到了重庆,那时重庆只有两个大学设有会计系,一个是重庆大学,另一个就是复旦,因为我是读会计的,那我当然读复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复旦有陈望道先生,复旦学生办有《中国学生导报》,对当时周围的学校是很有影响的,而且已经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共产党。

抗战前复旦就很有名气的,特别是复旦商学院。但复旦是不均衡的。复旦有很好的学生,非常优秀的,很多著名学者、科学家都是出自复旦。但因为复旦是私立的,是要靠学生交学费的,所以当时要进复旦也不是太难。那时候学生首先都想考国立大学,像我原先就读的上海商学院,那是很难考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浙江、江苏甚至安徽、福建的人都到上海来考国立大学,但国立大学很少,于是很多人最后还是进了私立大学。复旦要维持办学,那当然的是你有钱才能进,所以成绩不是太好也可以进复旦,但不一定能毕业,因为以前是“宽进严出”。所以在当时一些人眼中认为复旦的学生就是“花花公子”,这也是有的。复旦最著名的是会计系。当时我们会计系的课程有《初级会计》、《高级会计》、《成本会计》、《会计理论》、《审计学》等,还有会计实习和会计论文。此外主要就是《商法》,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是张光禹,他刚从美国回来。因为学生少,他就在他家里给我们上课。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他给我们上的《会计理论》。《会计理论》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国际会计准则》。那个时候还不叫《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叫做 Corporation Standards，是美国会计协会的主席根据美国股市发展的需要写的一本书，当时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后来张先生还讲起有一门没有开的课叫 Stabilized Accounting，即《稳定会计》。就是讲物价上涨，会计怎么表现、怎么运用，我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但这是我向张先生借来的讲义，自己看的。

大学生活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社团活动，实际上社团活动很锻炼一个人的才干。1942 年我们搞了一个“中复会计学会”，我们当时理想是很大的，所谓“中复会计学会”就是中国复旦会计学会，当时都这样讲。我们当时有一个简称 SOA，人家以为是 Society of Accountant，但实际真正的意思是 Specialists of Accounting，就是会计专家。我们当时是豪情满怀，想把会计系成绩好的同学都组织起来。我后来搞学校，跟这个组织也是很有关系的，在上海的同学都很支持我。我们当时搞这个会计学会，它有两个口号是我提出的，一个是“自信、互信、共信”，还有一个是从会计科目里面来的，会计科目里有关能源的叫“Heat、Light and Power”，我就把这个作为口号了，就是“发热、发光、有力量”！

抗战时期，有许多著名专家、教授、名流来复旦作各种报告，复旦的教授也经常应邀作报告，这对复旦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北大、清华和南开也有这样的机会，当时叫做西南联大。只有西南联大和复旦有这样的条件，一个在昆明、一个在重庆。学科广、教授好，这对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很有益处。当时什么生物学、心理学讲座我都去听的，也因为我学业比较好，常去听讲座，这个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益。

学校那时有一个规定：你所有学科的成绩都在 80 分以上，你可以多学 3 个学分；如果都在 85 分以上，就可以多学 6 个学

分。我那时往往每学期可以多学几个学分,我选的基本上都是法律系的课程,我觉得这对于促进个人思维的缜密非常有帮助。我们要充分利用复旦的资源,复旦有很多讲座,不要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其实随时可以去听。我到现在自然科学的一些东西都还记得。读大学首先是个根基的问题,多学一些东西,根基才能更稳固一些。生活上的事,只要不是醉心、迷恋的,有些细节是无所谓的,但年轻人总是要有个理想,不能只是追求享受,如果那样是很辜负复旦的!

我大学毕业时,有个很偶然的机会,被曾任复旦副校长的江一平先生邀往他在重庆刚办的一个酒精厂,因为重庆当时缺汽油,汽车只得靠烧酒精。重庆本来有个关闭了的酒精厂,1945年底他把它买下来了,但真正开始办的时候,却没人管账,于是就把我找去了。我能在那个厂里,主要与我在复旦打下的良好基础有关系,特别是我的法律知识,那时一个客户告了江一平,江一平没空,就叫我帮他去打这个官司,结果打赢了,江一平发现我法律知识也比较好,于是放心地把厂交给我管理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个厂就变成我在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算是我所有同学中最为幸运的,因为那时我才二十六岁啊!后来我回到复旦当助教,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有目的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目的,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后来我又到天津新闻通讯社做编辑主任,每天发新闻稿,事业都挺顺利的。所以说假如你真是一个大才,同样是一份工作,你就应该做得比别人更好!所以说做一件事,就要把一件事做好,当然跟个人才干有关系,但还有一点,就是跟工作态度也有关系!

1948年5月我回到了上海,投身地下党领导的职业青年工作,8月回复旦担任会计系助教。以后虽然组织关系不在复旦,但和学校地下党会计系支部的同学及助教中的进步力量都有比较密切的接触,积极参加筹组复旦讲师助教联合会,并代表

它进而组织上海市讲助联。直到1949年4月我被调到闸北做迎接解放和策反工作。

解放初,我参加了闸北区的接管工作,后任区政府工商科负责人。此后,我在中学做了20多年语文教师,后来就管教育行政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第一号(“牛鬼蛇神”)人物,被关起来了。1976年“文革”结束,三中全会决定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中央有些领导人就提到了要学习管理。1979年初,我就开始从事管理教育了,当时在全国范围来讲都算是最早的。但不是在正规的大学,是在闸北区的一所业余大学。那时闸北区有一所学校,叫“721大学”,就是在这所毛泽东时代为工人办的学校的基础上,我去了之后就搞起了管理教育。这个学校很快改称为闸北区的业余大学。从197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搞企业管理专业了,当时国内也有搞企业管理专业的,比如交大,但事实上他们搞的是麻省理工的企业管理,实际上是工业管理,并不是企管,更不是我们管理学院现在搞的经营管理。我当时搞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管理——商学院的管理。我们同时学习美国一些管理学院的课程,其中就有一门叫做Operation Research,翻译过来就是《运筹学》。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奇妙?我就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那里居然有一本Operation Research,从来没有人借过!这个时候比较早,图书馆引进国外图书,就进了Operation Research。当时没人知道Operation Research,我就把它借出来了,交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在青海劳教的复旦物理系校友陈尚霖,他就把这本书带回青海研究,1980年回上海后就可以在我们学校教了。当时的Operation Research现在来看那个《运筹学》当然比较肤浅了,但我们是最早从事研究的,陈尚霖是国内首先接触这门学科的。

这样一所大学我在当时是怎么能搞起来的呢?就是完全依靠我在复旦的同学。在一个区里面,哪里去找那么多懂管理的人

来教书呢？我就去找了一些被打成“右派”的，甚至在外地劳改的受冤屈的同学，以及我所晓得的在上海的老师、同学，把他们请到我这里来讲课，也有的是调过来的，一共有 30 多个人。这样才解决师资问题。所以说一句话就是靠复旦。在旧中国，有两个商学院是最有名的。一个是财大，当时叫做上海商学院；另一个就是复旦商学院。但是上海商学院，毕竟人数很少。在上海来说，复旦商学院是最有名气的，在全国范围来讲，影响也很大。当时我请来讲课的，都是在学校学得很好的，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十年后还能教书的老师、同学。我这个学校在 1980 年开始招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师资有限，只能办两个班。当时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读到高二、高三就失学的、书读得非常好且比较关心时事的、一些有眼光的青年都想去学管理，但是只有我们这里有！报名的有 800 人，我们只招 100 人，于是要 8 个人中录取 1 个！

当时我们开了一门《商用数学》课，由陈尚霖教，这门《商用数学》课的核心就是“利息问题”，也就是讲复利。当时有一个学生是闸北区街道工厂的厂长，在两节课中间休息时那个学生就来找我，因为我是负责人。他说：“吴老师，陈老师上课讲复利，这个复利就是利滚利吧。”我说：“对啊。”他说：“那这个跟杨白劳有什么区别？”他在质问。一个学企业管理的学生竟然提出这样的质问，现在听了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可见当时我们办学是冲破了多大的阻力，不要说上面的压力，连学生都提出抗议。江青就讲过：“银行不应该要利息，中国借钱给其他国家也不应要利息。”那个时候不要说复利，连利息都不能说的，这些今天听来也许是天方夜谭吧。当时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把改革开放当作笑话，但是仍有许多有识青年来报考我们学校，所以我们要 8 个人中取 1 个，靠什么，就是靠复旦同学齐心才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后来许多年，这所学校连续被评为全国成人高校中的全国先进，而且这所学校现在已经变成一所参加高考

统一招生的正规大学了,叫做“行健职业学院”。现在职业学校很多是民办的,比如“杉达”等等,但是公办的职业学校不多,也就那么两三所。现在复旦在那里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认识的那批人都已经走了,这是后话。但就是原先我们这三十几个复旦人才把这个学校搞起来的。

说到复旦校友会,它的成立有一个过程。在三中全会后,可以自由集会了,最早是重庆时期的复旦同学,我们第一次是在人民公园大聚会,以后商学院、土木系、农学院的校友,都定期举行联谊活动,大家都希望正式成立校友会。那时候还没有校友会,学校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也比较模糊:不反对也不赞成。后来是副校长周谷城教授支持,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分管教科文的副委员长。得到他的支持后,校友会才办了起来。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到他家访问过他好多次。我虽然一直对校友会工作比较热心,担任常务理事,但直到离休以后,才开始做复旦上海校友会第二任秘书长的。我的同学现在大部分还是在国内,出去的比较少。我们中有一个到台湾的,叫鲍尔一。在台湾如果你要考注册会计师的话,就要以他的两本会计学书为教材。台湾一些著名大学的会计系都是把他的书当课本的。当时台湾跟我们这里还不通邮,鲍尔一就把书寄给李达三,李达三再转寄给我,光邮票就好几百块港币,后来我把这两本书捐给会计系了,交给了会计系第一任系主任张文先。前两年我还问过台湾校友:“现在鲍尔一的书还用吗?”他们说:“还在用啊。”但鲍尔一于20世纪80年代末就过世了。80年代中,我有事去香港,一个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有什么管理方面的好书。我当时跟李达三已经在通信了,知道他在香港,他当时也给我寄过一些关于会计的资料。当时我也没想去看他,但是很偶然,在游览的过程中安排到中文大学参观,我发现中文大学董事李达三捐赠了一栋“达三楼”,于是我就去找李达三了。他在请我

吃饭时,我说:“达三啊,你给中文大学捐了一栋楼,也应该给复旦捐一栋楼吧?”他说:“这没有问题。”我说:“那我回去跟他们讲。”他说:“好、好。”后来我就跟复旦的副校长讲这个事,他也说:“好。”但是当时复旦没有会计系,其时中央已经注意加强对高级会计人才的培养,李达三就说:“这会计系都没有,那我捐钱算什么呢?”这个时候复旦的姚一霖就说:“中国现在是缺工程师,但是更缺会计师。”当时朱镕基也讲了:“复旦要恢复会计系。”复旦也在酝酿这个事情。所以1990年搞第一届“世界复旦校友联谊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一位副校长就告诉李达三,要恢复会计系了,而李达三原来已经答应过了,于是也就正式决定捐资建造大楼了,即现在的“李达三楼”。

在我们复旦确定到底是用老校歌还是新校歌的问题上,恐怕我也是较早提出看法的。学校党委第一次召集校友座谈百年校庆时,我就提出恢复老校歌的问题,当时包括党委书记在内大家觉得很突然。但这之后居然还有一位校友,他是外地校友会的会长,在开各地校友联谊会时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能改呢?”我晓得这件事后,就在复旦上海校友会的会刊上登了一篇文章,完全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来讲我们恢复老校歌是合适的。那些头脑僵化的人认为老校歌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两句话是跟我们党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术不独立,思想不自由,学校又怎么能够发展呢?我觉得复旦恐怕就是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一点上是较为突出的!现在老校歌终于恢复了,这对所有复旦人是一件大喜事!

二十余年来,我在复旦校友会的工作中,接触过很多校友,渐渐有一个体会:无论人在天南地北,年龄二三十还是八九十,复旦人总是热爱复旦的,总是想为复旦、为国家作一点事情的。

(采访整理:童亮、高蓓雯、蒋飞飞)

从历史起航,追寻那光

——苏德慈校友访谈录



伦敦西大主教在华东神学院访问,图中右一为苏德慈

苏德慈,男,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华东神学院院长、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4年参加筹建华东神学院,并在基督教机构中任职。1985年起担任华东神学院副教务长,教务长。1990年6月—1992年5月赴美国卫斯理神学院学习,获神学研究硕士学位。1993年7月担任华东神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长。1995年11月起担任华东神学院院长是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